

# 给新闻作注释：历史的方法与科学性

韩立新，梁馨元

(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河北保定 071000)

**摘要：**在网络传播中，不符合新闻报道本意的讨论频繁发生。不仅非专业媒体发布的内容会被误读，主流媒体、大众媒体等专业媒体发布的内容也存在大量被误读的情况，这就导致有关网络热点的讨论常常背离新闻本意。无论是对新闻事实的断章取义，还是对新闻事实的曲解，都会形成对新闻报道当事人和新闻编写发布者的挑战和伤害。引发不符合新闻报道本意讨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与新闻报道的专业性和传播过程的规范性有关，也关系着新闻报道文体的科学性，反映了新闻报道的文体缺陷。本文以历史研究方法为指导，选取新闻样本进行观察研究，提出了维护新闻报道本意的“注释方案”。将新闻注释这种手段和方式作为新闻科学性的一种探索，进而观察到新媒体对于新闻学及新闻业真正的意义所在。

**关键词：**新闻注释；历史研究方法；新闻本意；邵飘萍之死

**中图分类号：**G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418 (2023) 06-0002-07

## 一、问题的提出

近来，一则一对父母在为因救朋友而溺亡的儿子申请见义勇为称号时经历一波三折的新闻引起了笔者的关注。当事人的儿子张某在跳入河中救人时遇难，有关部门拒绝颁发荣誉称号和证书，此事引发了网络议论。记者在联系辖区县政法委后被告知需要联系县委宣传部，而县委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则婉拒了采访。像这样应该接受采访的事件，公职人员却拒绝记者采访，他们在担心什么呢？

公职人员拒绝采访的理由有很多，或出于故意逃避问题，或涉及与利益相关的影响，或受到上级领导部门的要求等。其中，担心被曲解、进而引发舆论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原因。这种担心自身的语言和行为经过新闻传播后使受众产生理解偏差，进而陷入舆论困扰的现象，反映了新闻报道与传播过程中存在的一种问题，即媒体发布的新闻文本不能保证新闻本意被准确理解。新闻工作者应当在传播过程中维护新闻的本意，找出能够维护新闻本意的切实有效的办法。

通过对采访被拒及新闻传者本意被曲解现象的观察，笔者发现了新闻文本的缺陷，即不能保障事实所包含的意义“如实”传递给接收者。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虽然不同受众往往基于自身的价值立场和已有信息对新闻予以解读，虽然新闻文本中的事实<sup>①</sup>具有多义性，但新闻文本被误读的原因并不仅限于此，因为误读不仅发生在对文本接受的过程中，也发生在接收文本的过程中。这种情况表明，新闻文本在科学性上还有待求索。

马克思曾提出“有机的报纸运动”的观点，认为新闻真实是一个过程，虽然单篇报道可能具有片面性，但新闻的后续报道和引发的讨论能够修正误差，能够在不断的有机运动中抵达真实。马克思在这里阐述了一个重要的新闻思想，即新闻真实是通过一个报道过程实现的，受众通过这个报道过程才能实现对新闻真实的把握。但在实际的传播过程中，受众总是通过每个新闻文本了解事实，并不能观

**作者简介：**韩立新，男，教授，博士生导师；梁馨元，女，硕士研究生。

**①** 新闻文本中的事实，指新闻文体记录的事实，即被认识和报道的事实，以与实际发生的新闻事实，即客观事实相区分。

察整个过程,这就为误读提供了可能。

到底是何种因素导致新闻文本被误读的呢?从新闻文本本身入手进行分析,我们发现新闻文本对于客观事实的反映具有片面性和阶段性。新闻在创作和传播的过程中包含传者和读者的主观意志,这说明现有的新闻文本结构并不能够实现对新闻本意的维护。通过文献梳理,笔者发现注释是文本作品中广泛存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追寻本意的重要方法。在文本中使用注释,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可以实现对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学术研究要求我们对研究成果中引用的其他学术成果进行注释,并且有着严格的注释标准,这在极大程度上提高了文本建构的科学性和意思表达的确切性;二是提供了一种互文性,借助其他文本之力保障表达的科学性和理解的准确度。

## 二、研究方法与分析

### (一) 研究方法

给新闻文本增加注释能不能保障事实所包含的意义被“如实”传递给接收者呢?如何证明这个问题成立或不成立呢?

史学文本对于历史事实及其意义描述的准确性,并不依靠生动的修辞来实现,而是建立在提供实物依据及相应的史学研究法上的;刑侦文书对于案件所涉事实本意的保障,是以证据和适用法律条款为依托的,是建立在包括问询、勘验、搜查、扣押、稽查等调查工作与包括强制性措施在内的刑侦工作基础上的。这值得借鉴。

史学家何炳松认为,“是故吾人为解释史料计,必须应用历史研究法于社会科学上。盖社会科学之研究多以史料为根据;社会科学之智识多用间接方法得来者也(实际几乎所有社会科学上之事实均用间接方法得来)。当事实集合之后,吾人不能不用与历史研究法相仿之方法以编比之;盖社会科学上之事实几全用历史的进程得来而组成一种有系统之浑仑者也”<sup>[1]</sup>。这里包含了史学使用证据及其使用证据的原则方面的思想:一是社会“现象并非永远不变者也”,认识就意味着“明了其演化情形”<sup>[1](22)</sup>,这体现的是使用证据的原则;二是认识特定对象的演化情形,需要通过对史料的编比,这种编比是使用证据的方法。“吾人编比事实可根据二种标准而分其范畴:(1)依据事实所能统括之程度;(2)依据断语所隶之种类。”<sup>[1](78)</sup>断语是“一串价值不等之言词”。断语反映了人们对事实理解的不同,如何对待这种不同呢?“必须以各种对象间之固有性质关系为标准。”<sup>[1](79)</sup>何炳松的史学思想对新闻文本维护和保障其本意的传播有借鉴意义。从新闻学上看,就是要建立一种开放性的互证结构的文本,才能把握认识对象的变化及对这种变化的复杂的社会认知——断语,进而保障文本的本意。

陆懋德则认为,研究者在构建文本时所使用的材料,分为“原料”和“次料”两大类。“原料”即最初的原始资料,“次料”指原始资料在加工后形成的资料。他认为,在编撰历史时对史料的运用,应当以对“原料”的使用为主,而对于史书价值的评判,也应当以对“原料”的史料运用为依据。“盖凡历史价值之优劣,不在文笔体例之高下,而全在采用史料之精确与否。”<sup>[2]</sup>陆懋德关于“原料”与“次料”的思想,从新闻学的视角看,就是要准确表达事实本有之意,要依赖“原料”。新闻文本构建时,使用采访方法获得的资料显然不全是“原料”,有许多材料来源于采访对象的言说,这种言说在很多情况下是“次料”。陆懋德认为,史学的两大主要任务是史料的搜集、考证和历史解释。他强调了解释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认为史学的终极目标在于对事实的解释。他认为,只有经过“解释史事之原因、变化与结果,及其已过、现在与未来之关系”<sup>[2](69)</sup>,历史才能具有时代价值。这启发我们,对于新闻文本的构建,不能仅仅强调信息来源的客观性,还要强调维护文本本意的保障性。陆懋德提出的方法是解释,这种解释不是主观解释,而是达到本意的发现。解释在新闻学看来,就是用来显现和维护本意的方法。注释,即提供文本所使用材料的来源及其可靠性,就是这种历史解释的手段和方法。

## （二）分析

在以上保障文本本意思的指导下，本研究选取1926年5月4日刊登在湖南《大公报》上的新闻《邵飘萍被奉联军枪毙之详情：死状极为凄惨 身后甚为萧条》作为研究样本，针对样本中存在的易引起理解歧义的部分和重点内容，结合所选取的新闻样本的特点，对该样本进行文献注释，以分析给新闻文本增加注释是否有助于减少读者在理解新闻内容时产生的歧义，保障事实所包含的意义“如实”传递给接收者这一问题。

研究样本的“被捕之经过”部分中说，“他日奉联军来京，于己之生命自生危险，遂于是夜避入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居住，多日不敢出门”<sup>[3]</sup>。此处容易使人产生揣度：为何邵飘萍会预感到自己有生命危险而久居酒店不敢出门呢？他是不是一个贪生怕死之人？想要回答这一问题，就需要用当时社会背景和邵飘萍处境等情况予以引证。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袁世凯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二十一条”，日本在我国制造了一系列血案。“邵飘萍在揭开日本侵华历史疮疤，揭露日本‘调集多数军队欲实现多年侵占间岛之阴谋’与‘野心’的同时，批评向来以兵力雄厚称功的奉系军阀‘醉梦于国内局部之争，不知思患预防致授人以莫大间隙，其罪实不可遁’。”<sup>[4]</sup>“在1925年国民革命高潮时，邵飘萍断言‘奉张直李鲁张诸人决无存在之余地’，并且在《京报》刊登了张作霖等人照片，直言张作霖已‘众叛亲离’，张宗昌为‘鲁民公敌’。张作霖深知邵飘萍笔杆子的号召力，曾经许诺30万元贿赂而遭到邵的拒绝。邵飘萍对吴佩孚虽说客气一点却也讥讽之‘除通电以外一无所成’。”<sup>[4](102)</sup>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反动军阀对邵飘萍产生了必除之而后快的恶念，联军入京之前也已将捕杀李大钊、邵飘萍等人在军事会议上列为特别重要紧迫的军事行动，这就是邵飘萍预感到自己处境十分危险的背景情况。“至于邵飘萍为什么不肯及时离开北京以避不测，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点是肯定的，他不肯轻易地放弃北京，放弃《京报》，他想利用矛盾，在险境中游刃。对奉鲁张作霖、李景林、张宗昌等人，邵飘萍曾言辞大不敬，抨击猛烈。而对于直系，本着分化的策略，却笔下留情。在冯郭联盟倒奉时，邵飘萍支持‘父让子继’，让张学良接任镇威军总司令，改造东北政局。加之飘萍与张学良有着私交，他希望这次也能化险为夷。”<sup>[4](100)</sup>他虽然深知自己处境危险，仍“嗣后偶因家事须自料理，而外间又传谓当局对于邵氏既往之行动，决不查究，邵氏深以为然”<sup>[3](246)</sup>，于是离开了久居的饭店而被捕。仅阅读以上这些资料，容易让人产生邵飘萍的被捕会不会是军阀临时决断的揣度。事实上，他的被捕是军阀精心策划的阴谋。“飘萍避居数日，心中十分焦急。联军入城后，北京《大陆报》社长张翰举，绰号‘夜壶张三’，主动为邵飘萍承担了联络斡旋之责，实际上他已被奉鲁收买，以诱捕飘萍作为换取‘造币厂厂长和大洋二万元’的条件……4月24日，飘萍家中打来电话，告知报馆和家里都有些事情。飘萍先与张翰举联系询问外面形势。张翰举诳骗说，形势已缓和，并诈骗，张学良已被疏通，同意飘萍在京继续办报。”<sup>[4](102)</sup>在这种情况下，他轻信了谎言而回到报馆，“孰料，报馆被监视。当汽车行至魏染胡同南口时，即被侦缉队拦阻，并由两名荷枪者押至警厅，夜8时左右警察厅侦缉一队队长南保祥又率30余名探兵包围京报馆，入报馆内，搜走邵飘萍《新俄国之研究》一书的底稿。查封了《京报》，并派军警把门，禁绝人员出入”<sup>[4](102)</sup>。可见，邵飘萍的此次被捕，并非是“运气不好”的“意外”，而是军阀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得逞。添加注释后的新闻，能够减少读者对于邵飘萍及其被捕事件性质的误解，知悉邵飘萍身上的不屈气节、处境的艰难以及此次谋害事件的恶劣。

在研究样本的“报界之营救”部分中提到了新闻界向张学良寻求帮助的过程，这会让不知内情的读者疑惑，为何当时的北京新闻界要派代表游说张学良呢？通过以下注释便可解释此中缘由。“张答谓：逮捕邵飘萍一事，老师与子玉及各将领早已有此种决定，并定一经捕到，即时就地枪决。余与飘萍私交不恶，惟此次要办飘萍并非因其记者关系，实以其宣传赤化，流毒社会，贻误青年，罪在不赦，碍难作主。”<sup>[3](246-247)</sup>张学良当时的答话，在不了解情况的人读来难免会不知其二。此处的“子玉”即



吴佩孚,“老师”即张作霖,这说明捕杀邵飘萍是当时军阀高层的阴谋,目的便是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也是为直奉联军进入北京博得出师之名,并以此控制住局面的策略。这也从侧面印证了为何与邵飘萍甚有私交的张学良的拒绝态度是如此坚决的原因。“张学良甚至讲出这样的话来:‘飘萍虽死,已可扬名,诸君何必如此,强我所难。’他还对代表们表示:他是宁肯‘一一负荆请罪’,但‘此事实无挽回余地’”<sup>[5]</sup>,且“直奉联军正在势头上,局势险恶,最终无人再敢于进谏,对邵飘萍的营救终于无果”<sup>[5](325)</sup>。在阅读没有注释的新闻后,读者可能会认为张学良的拒绝是托辞,但在加上新闻注释后,读者可以观察到张学良对营救请求的拒绝实则是当时军阀统治的一种表现。

在研究样本的“临死之情状”部分中,虽然向读者报道了邵飘萍被杀害的经过,但弱化了该事件的残酷性,读者并不能够从中感受到邵飘萍遇害场面的残忍和血腥。“4月26日凌晨1时许,直奉联军总执法处草草提审了邵飘萍,审问只进行了两个多小时,随后判处邵飘萍死刑。5时许,邵飘萍即被绑赴天桥刑场枪毙。”<sup>[5](325-326)</sup> 这些记述简单粗略,并没有充分反映事件性质。“记录邵飘萍遇害种种情景的那十幅照片中有五幅是在邵飘萍被枪杀后的临时掩埋处拍的,有两幅是在地藏庵的临时灵堂前拍的,有三幅是在他大殓前后的临时停放处拍的,在当时全都不曾发表过。从这些照片中,人们可以看到血肉模糊惨不忍睹的遗体,可以看到弥漫着惨雾愁云的殡殓场景,也可以看到家属们在灵前悲痛欲绝的镜头。这些照片资料使人们仿佛回到了充满血雨腥风的那个可诅咒的时代。屠夫们的凶残,令人发指。”<sup>[6]</sup>若是加上这些注释,读者对于军阀统治的残暴性及当时文化界、新闻界的悲惨处境会有更好的认知。

研究样本的“家族之情况”和“邵氏之身后”部分,介绍了邵飘萍被杀害后包括报馆、家人及后事安排等情况,但关于其剩余财产的陈述容易引起歧义:“说者谓邵氏颇有积蓄。兹据调查,邵氏平日最好排场其实私债积欠甚深。闻其临死之日,京报馆会计处只余七十元,而其妻之嫁妆如钻石珠器等亦被抵押一空。”<sup>[3](247)</sup>报道中的这些内容会让读者产生对邵飘萍生活方式的误读,倘若读者事先接触过有关邵飘萍生活奢靡的片面信息,就会强化对于邵飘萍的倾向性认知。如果加入以下注释,读者对报道中所陈述的经济拮据的状况就会有新的理解:“邵飘萍成名后,个人生活非常讲究,出入都是小汽车,他是民国第一位自备汽车采访的记者,汽车也给他工作带来了许多便利,使他能够大模大样地出入一些别的记者进入不了的场合,连他的香烟都是特制的(上有‘振青’的字样)。有一定经济能力的邵飘萍喜欢周济人,对有困难的人非常关心体贴。别人有所需求时,只要他口袋里有钱,总是慷慨帮助,即使弄到自己一文不名,他也不在乎……青年们因为经济困难,上不了学,有求于他时,他总是热情地帮助甚至无条件地承担他们的学费。每逢新学期开学,不见原来接受他帮助的青年人前来领取学费时,他都非常着急。知道地址的就写信去查问,地址不清楚的,就在报上刊登启事,催他们来领。”<sup>[7]</sup>“在旧中国的新闻记者当中,邵飘萍称得上是有骨气的。他坚持独立办报的方针,主张新闻工作者应该‘艰苦卓绝’;应该‘虽幽因受辱而安之若素’;应该‘尽自己之天职’‘平社会之不平’‘苟见有强凌弱,众暴寡之行为,必毅然伸张人道,而为弱者吐不平之气,使豪暴之徒不敢逞其志,不能不屈伏于舆论之制裁’。”<sup>[8]</sup>“邵飘萍还提倡新闻记者应该有‘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精神;经常以‘铁辣手’自勉;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作为自己和全体《京报》工作人员的座右铭。由于经费困难,他有时也接受一些人的资助,但从不为反动军阀所左右。对反动封建军阀的高价收买能够断然拒绝。在从事新闻工作的14年当中,他曾经四被追捕,数入牢狱,而民主革命之志终不屈挠。只要是合乎真理、合乎正义的事情,他认准了,就一定坚持到底,鼎镬不辞。”<sup>[8](154-155)</sup>在阅读新闻的过程中,读者往往难以与当时的社会环境联系起来。“此前虽说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对新闻记者公然不经法院审判而夺人之命,却是首开之例,这也只有‘绿林’出身赳赳武夫的张作霖之辈才做得出来。”<sup>[5](330)</sup>“当时《民国日报》亦称:邵飘萍是‘以身殉报’。”<sup>[5](330)</sup>“从此,‘五四’后北

京逐渐凝聚起来的新文化运动的人脉和人气，或许终于因此不可阻挡地衰败下去了，许多人即使躲过了一时的劫难，最终还是告别北京而它去，于是，也由此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文化重心和文学中心等南渡现象，庶几，也由此带动了中国政治版图的演变。”<sup>[5](330)</sup> 这些和事件相关的情况，如果能以注释的形式同时进入新闻文本，读者对于新闻报道的理解就能够更加全面和深刻。

通过对《邵飘萍被奉联军枪毙之详情：死状极为凄惨 身后甚为萧条》报道的相关历史资料的考察发现，一是报道中提供的资料，并未反映事件自身的历史原貌。二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认识和理解，即阅读新闻报道所产生的理解，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了解事件背景及相关情况的读者，在阅读报道后可能会更好地理解新闻内容，但在个人前见影响下也容易产生与新闻报道本意不同的认识；另一种情况是不了解事件背景及相关情况的读者，即仅仅通过阅读新闻报道理解事件的读者，很难对事件本身有准确的认识和理解，不能保证对新闻报道本意的理解。

新闻研究样本注释前后的差别，是材料完善与否意义上的差别。这一考察说明了新闻文本不能维护本意的原因所在，即材料的不完善性，也说明了注释对于理解新闻样本的重要性。新闻注释的目的在于建构一个材料完善的新闻文本形态，并以此促进读者对新闻本意的把握。虽然完善的材料并不一定能确保读者对新闻本意的理解，但能够提升文本表达本意的水平，使新闻文本形态本身得到完善。因此，从文本建构的角度来看，新闻注释对维护新闻报道本意的作用是显著的，但从传播过程来看，接收者的前见、动机，仍然影响其对新闻文本的理解。从新闻报道本意的显现与维护来看，接收者的范围越大，经过注释的新闻维护其本意的可能性越高，毕竟出于前见和动机这些源于接收者主观性的误读，在扩大受者范围后，这种“接收者的一致性”<sup>①</sup>出现的可能性还是较低的。

“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莱特”，是指文学作品引发读者理解的多样性。新闻文本是对现实真实存在的客观对象的反映，能够产生多少理解，不是由新闻文本决定的，而是由新闻报道所反映的事实决定的。如果这种理解对于新闻事实而言是扭曲的，如果新闻文本不能保障传递明确的意义，则说明新闻报道存在科学性的问题。

在无注释的新闻研究样本中，仅有对于邵飘萍被杀害的有关情况“点”的介绍，没有对其来龙去脉、前因后果的“线”的解释。这种新闻文本向读者提供的是事态，不是事件。事态是事件的新变化，事件则是事情本身的客观面貌。对新闻文本进行注释就是实现从对事态的反映上升到对事件的反映，就是通过改进以事态为报道焦点的文本结构，以使其呈现事件的全面情况，是关于新闻文本建构的探索。

### 三、认识与讨论

#### （一）新闻文本建构中存在的悖论

研究发现，读者对于新闻报道的理解和新闻本意之间的差距确实存在。新闻报道在传播过程中呈现出多义性，从这种多义性中可以发现新闻文本建构中存在的悖论。

新闻科学性的标准是什么呢？恩格斯说：“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sup>[9]</sup> 对于事实的反映是科学的最本质特征。就社会科学的科学性而言，“强调客观化的立场及采用量化分析的方法，可以看作它的重要性质”<sup>[10]</sup>。有一种关于“科学”的最广义的理解，即确定性、体系性、理论性的知识：理论性是对内容和目标任务的要求，即科学要追问原因和原理；确定性是对内在特质的要求，即科学不能似是而非、模棱两可；体系性是对外观形态的要求，即科学要以体

① 指在接收者中，出现“出于前见和动机的接收者故意误读新闻文本本意”这种情况的一致性。当扩大接收者范围后，这种故意误读新闻文本的接收者的比例会降低。

系化的形式呈现出来。<sup>[11]</sup> 将此类标准推广到新闻学中, 我们将新闻科学性的标准定义为能够通过体系化方法反映具备确定性的客观事实。客观事实指的是被人类的实践活动影响过的客观事物的现象和过程。<sup>[9](270)</sup>

“新闻”作为人类认识事物的一种方式, 它所选择的观察视角和对对象的记录, 只是特定事物的一部分, 新闻的客观性原则是在这一部分意义上成立的。实际的文本建构过程是“作者”根据一定观念进行的主观能动性的选择和认识行为。这样一来, 新闻文本的建构过程实际上就成了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过程。新闻文本作为反映事物特定部分的文本, 放大了文本建构过程中主观性的作用, 放大了创作这个文本的记者、编辑和媒体对事实反映所起的作用。因为新闻文本所反映的对象——事物本身是客观的, 它不会因为新闻反映它的一部分而改变其面貌和性质。当建构新闻文本过程中作者的主观性符合事物的面貌和性质时, 新闻文本就实现了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 本文称之为“的论”; 当建构新闻文本过程中作者的主观性不符合事物的面貌和性质时, 它隐藏在客观化的材料背后, 以客观化的形式表现出来, 这时新闻文本中的主观性与客观性是矛盾的, 是悖论。当新闻文本在认识上是“的论”时, 维护它的本意就符合新闻伦理; 当新闻文本在认识上存在悖论时, 维护它的本意就违背新闻伦理。所以, 维护新闻文本的本意就需要实现新闻文本在认识上的科学性。新闻学理论所阐述的客观性原则并不能保证新闻文本建构的科学性, 它时常使新闻文本成为记者、编辑和媒体表达主观意志的面纱, 所以还需要阐述新的原则来限制这种主观性的随意客观化, 即随意选择和借用客观性材料来表达主观意志。这种新的原则就是马克思阐述的全部事实原则, 以及学术研究所要求的检验原则。对新闻进行注释是这两个原则所要求的一种方法, 它通过提供知识和更全面的材料来实现对于全面事实的反映和可检验的科学性要求。

## (二) 对新变化的反映与事物自身的整体性、历史性

新闻文本的本意是不是记者、编辑或媒体所要表达的意图、观念等主观性的东西? 这要区分两种情况: 一是记者、编辑或媒体在新闻文本建构中的主观能动性; 二是记者、编辑或媒体在新闻文本建构过程中的外在观念输入。主观能动性是对认识对象本质的发现, 是新闻认识功能的反映; 外在观念输入是传者意图和动机与事实的文本拼图, 是背离或模糊认识对象本质的文本建构行为。

杨保军认为, 新闻的本体功能是认知功能, 是决定新闻之所以能够成为新闻的功能条件。就是说, 具有认知功能的信息才有可能成为新闻。认知功能, 就是能够消除人们认知不确定性的功能, 提供新知和新信息的功能。经济功能、舆论功能和文化功能等是新闻的派生功能。新闻的本体功能是根, 派生功能是干、是枝、是叶。人们通过新闻认识和对新闻的认识, 目的是为了用与事实世界近乎同步变化的眼光来观察和了解事实世界的最新变动情况, 从而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寻求更有效、更美好的路径。<sup>[12]</sup> 这里阐述了两个思想: 一是新闻派生功能的实现依赖其本体功能, 即认识功能的实现; 二是新闻的认识功能对于接收者而言是了解新变化, 从而谋生存的需要。否定了前者, 新闻的科学性及新闻学的科学性就失去了基础; 否定了后者, 新闻就失去了其应用价值。那么, 如何保障和完善新闻文本认识功能的实现呢?

新闻是人们对客观存在事物新变化的观察方式和认识方式, 新闻文本是这种观察的产物, 新闻报道是将这种观察方式、认识方式及其产物职业化的结果。这样就出现了一个不等式, 即新闻文本(news text) 小于客观对象(objective things), 用公式表示就是:  $N < O$ 。N 代指 news text, 即新闻文本; O 代指 objective things, 即客观对象。 $N < O$  的不等式表明, 对 N 的认识反映不同于对 O 的认识反映。就是说, 人们如果将新闻及新闻文本作为认识对象, 所形成的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与将客观事物本身作为认识对象所形成的认识是不同的。这样, 新闻及新闻文本一方面使客观事物的新变化在人们的认识过程中获得了优先性; 另一方面也凸显了新变化的局部性, 遮盖了其整体性和历史性, 在提高人们认

识事物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在认识客观事物的过程中科学性不足的风险。如何对待这种“不同”和“风险”呢？前面的研究发现，从新闻文本的结构来看，新闻注释能够起到完善结构的作用，为新闻文本反映对象的整体性和历史性提供了一种方式，提高了采编人员的文本控制水平；从新闻文本的传播过程来看，至少起到了提醒读者的作用。从研究过程来看，新闻注释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促进了读者对于新闻文本本意的探索 and 发现；二是有助于读者对新闻文本的科学解码。这样，新闻注释在实际的传播过程及新闻学理论中，就明确了新闻文本和新闻受众反映和认识新闻的共同的唯一的标准，即客观事物本身。

总之，新闻客观性原则指引下的新闻写作在科学性上并不完善，它既不能保障新闻文本本意在传播过程中得以维护，也不能保障新闻文本如实反映客观事物，它需要有一种补充性或协同性的原则，以保障新闻客观性原则不成为被人利用的手段。经考察发现，汲取书籍和学术论文中的“注释”这一方式，对新闻文本体例进行改进，便是新闻文本结构创新——以科学性为目标的一种探索。传统纸媒受媒介特性的限制，进行新闻注释的手段和方式较少，新媒体则提供了更多的手段和方式。将这种手段和方式作为新闻科学性的一种探索，将会观察到新媒体对于新闻学及新闻业真正的意义所在。

#### 参考文献：

- [1] 何炳松. 通史新义 [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22.
- [2] 陆懋德. 史学方法大纲 [M].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资料室，1980：18.
- [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东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 东阳文史资料选辑 第 2 辑 邵飘萍史料专辑 附第 1 辑目录 [M].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东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1985：246.
- [4] 孙晓阳. 中外名记者丛书 邵飘萍 [M].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5：101.
- [5] 郭汾阳. 铁肩辣手 邵飘萍传 [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323.
- [6]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新闻学论集》编辑组. 新闻学论集 第 7 辑 [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13.
- [7] 林溪声，张耐冬. 报人时代 邵飘萍与《京报》[M]. 北京：中华书局，2008：223-224.
- [8] 邵飘萍. 邵飘萍新闻通讯选 [M].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3：154.
- [9] 徐天芬. 自然辩证法教学疑难问题探讨 [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268.
- [10] 张志林，陈少明. 反本质主义与知识问题 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扩展研究 [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149.
- [11] 郭栋. 法学的科学性何以可能——评舒国滢教授著《法学的知识谱系》[J].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21（6）：46-66.
- [12] 杨保军. 论新闻的本体功能与派生功能 [J]. 理论月刊，2010（3）：5-11.

[责任编辑：谢薇娜]